

资治通鉴选读

陈光崇 顾奎相 选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孙安邦 郭平凡
李 凭 李广洁

资治通鉴选读

陈光崇 顾奎相选注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.5 字数: 243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200册

*

书号: 11088·127 定价: 2.25元

前 言

一

司马光(1019—1086年)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)人。他从小爱好史学，七岁时，听人讲《左氏春秋》一遍，就能复述大意。他学习时，不但注意熟读课文，还要求懂得书中所说的道理。他说：“书不可不成诵，或在马上，或中夜不寝，时咏其文，思其义，所得多矣(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)。”他还主张读书要自强不息，说“君子好学不厌，自强不息，推之使远，廓之使大，耸之使高，研之使深(《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十八《四言铭系述》)”。司马光正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，因而很早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。知识既很渊博，文章写的也好，淳深古朴，有西汉的风格。

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，司马光二十岁就考取了进士，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。那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在杭州做官，因此请改签书苏州判官事，以便省亲。但不久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，在家服丧达五年之久。这期间，他闭户读书，写了好些文章，如《十哲论》、《才德论》、《廉颇论》、《龚君实论》、《河间献王赞》等，还有史评十八首，开始了他的著述之业。

庆历五年(1045年)，司马光服丧期满，任武成军判官。入为大理评事，累迁殿中丞、史馆检讨，编修日历。应庞籍的征聘，出为郢州学官、并州通判。再入为太常博士、直秘阁。嘉祐

六年（1061年），迁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，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、知谏院，从此做了七年的谏官。英宗时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神宗即位，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御史中丞。这期间，司马光历官中外，尽忠职守。特别是担任谏官之后，以言自励，直言谏论，不避权势。遇有重大问题，敢于以去就相争，表现了政治家的高尚风格。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因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。次年，改判西京御史台。从此便以一个闲散的官员，住在洛阳，专心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历十五年之久。
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宋神宗死了，哲宗以冲龄即位，宣仁太后高氏听政。高氏素不满于新法，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。司马光因此与吕公著、文彦博等一道，大力推行变更新法的主张，把保甲、方田、市易、保马诸法一件件地废除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他把新法“铲革略尽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之后，便在这年九月去世了。他的著作有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、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三十卷、《稽古录》十卷、《涑水纪闻》十六卷、《传家集》八十卷等。

二

司马光开始计划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。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，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，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，作了扼要的记载，名为《历年图》，共分五卷，在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进给宋英宗。接着在这一基础上写成《通志》八卷，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止秦二世三年，这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前八卷。进奏以后，引起英宗的重视。治平三年四月，英宗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，自行选择协修人员，编辑历代君臣事

迹。由于官府的支持，司马光得以安心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。治平四年，宋神宗即位，司马光进读《通志》，神宗以其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（胡三省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），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且为它写了一篇序文，鼓励司马光把书编好。

司马光在编纂《通鉴》时，先后奏调了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作为协修。他们和司马光都是志同道合，具有专门研究的史家。在协修人员中都有各自的分工，初期由刘攽负责汉史长编，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（包括隋朝）长编。司马光移官洛阳以后，分工作了调整，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，刘恕负责五代史长编，刘攽接替刘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。后来刘恕死了，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。《通鉴》的初稿，也就是各朝历史的长编，都由协修人员负责编写。司马光总其大成，对于全书的体例、书法，以及史料的考订，文章的剪裁，乃至句法的锤炼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、不同文笔的史料，熔铸于一炉，浑然一体，自成一家，充分发挥了主编的重要作用。

在编写《通鉴》的过程中，从开始收集资料到最后写成定稿，司马光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方法和步骤。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，按照年月顺序，标明事目，剪粘排列起来，叫做丛目。丛目要求尽量详备，凡是各种史料“稍与其事相涉者，即注之过多不害”（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卷六十三《答范梦得》），这是第一稿。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，进行初步整理，经过选择，决定取舍，然后重新组织，从文辞上加以修正。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，须加考订，说明取舍的理由，作为附注。由此写成第二稿，叫做长编。长编的写作原则是“宁失于繁，毋失于略，”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。丛目和长编都由协修人员负责整理编写，抄录则另有书吏。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，考其同异，删其繁冗，修改润色，写成《通鉴》的定稿。刘恕的儿子刘义仲在

《通鉴问疑》中说：“先人在书局，止类事迹，勒成长编，其是非予夺之际，一出君实笔削”。可见《通鉴》虽由多人协修，而勒成删定，则全出司马光一人之手。

《通鉴》的编写，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。首先是占有了广泛而丰富的史料。司马光说他修《通鉴》，“遍阅旧史，旁及小说，简牍盈积，浩如烟海”（《传家集》卷十七《进资治通鉴表》）。他究竟采用了多少种资料，据宋人高似孙说：“《通鉴》采正史之外，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”。看来已经不少了。但清人胡元常录《通鉴考异》所载书名，作《通鉴引书考》，除文集不录外，凡得二百七十二种，比高似孙所说更多一些。近人张须在《通鉴学》一书中，据《通鉴》和《通鉴考异》所引各书，分为正史、编年、别史、杂史、霸史、传记（附碑碣）、奏议（附别集）、地理、小说、诸子十类，共得三百零一种，但不免仍有讹缺。我在《通鉴引用书目补正》一文中（载《资治通鉴丛论》），考定《通鉴》引书实有三百五十九种之多，可见其取材的宏富。

《通鉴》的编写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光在运用史料时建立的考异方法。由于司马光占有丰富的史料，一件史事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参互写成，这样就难免要遇到记载的异同，史实的真伪。为了弄清事实，决定取舍，司马光提出了考异的方法，先从长编做起。他对范祖禹说：“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，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，情理近于事实者，修入正文，余者注于其下，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。”为了说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委，司马光还制定了一个撰写考异的公式：“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，今按某书证验云云，或无证验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，今从某书为定；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，则云今两从之（《与范梦得》）。”现存《通鉴考异》中的条文，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

公式写的。《考异》的条文，繁简不一，视情况而定。有的不过寥寥数字，也有长达二千五百七十三字的。但不管文字的多少，都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待史料的严肃认真的态度。

长编中的考异，原注于正文之下，但经过司马光修定以后，把注文别出，另成《通鉴考异》三十卷，与《资治通鉴》同时奏进，相辅而行。后来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才把《考异》散入正文之下，不过至今还有《通鉴考异》的单行本流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论《通鉴考异》时说：“修史之家，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，有之，实自光始。”这就可见司马光建立考异法，对历史编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贡献。

司马光从治平三年奉命编写《通鉴》，每编完一代，就把书进给朝廷。到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以前，五年之间，在开封编完了周、秦、汉、魏四代的历史。熙宁四年以后，他把书局迁到洛阳，经过十四年，到元丰七年，继续编完晋至后周十二代的历史，合计二百九十四卷，另编《目录》、《考异》各三十卷，一并进呈。于是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包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巨著《资治通鉴》大功告成。

《通鉴》完成以后，宋哲宗命范祖禹、司马康等加以校定，于元祐元年校定完毕，送往杭州雕版，到元祐七年全书印成，并得“立于学官，与六籍并行”（《范太史集》卷三十七《告文正公庙文》），可见当时对这部史书的高度重视了。

三

《通鉴》一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中国古代的通史著作，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那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名著。班固采用《史记》的体例，写成记述前汉一代历史的《汉书》，从此断代为史的风气相沿不变。不但正史如此，编年体的史书如荀悦《汉

纪》、干宝《晋纪》等，也都是如此。这些史书前后不相贯穿，卷帙又很繁重，学者深感不便。梁武帝撰有《通史》，唐姚康撰有《统史》，意在改断代会为会通，但这两部书很早就亡佚了。司马光根据卷帙浩繁的旧史，“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”（《进资治通鉴表》），写成一部编年体的通史——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是当时史学上一个伟大的创举。

司马光极为重视《左传》。《通鉴》不始于上古，而始于战国，用意就在于上接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叙事至智伯而止，《通鉴》虽托始于魏、赵、韩初命为诸侯一事，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，正好与《左传》衔接。《左传》是我国古代文学价值很高的一部历史典籍，以《左传》为典范的《通鉴》在叙事方面也有很多优点。

《通鉴》用编年的方法，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，对各种史事的发展变化、前因后果，容易使人得到一个系统的明晰的印象。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，作者根据各种分散的材料，集中加以描述，把当时复杂的史事，多样的人物，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。如赤壁之战，肥水之战，都是叙事文中的佳作。即使象五胡十六国这样迭起迭衰，纷拏交错的局面，《通鉴》也“叙之井井，不漏不烦”（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），充分表现了作者独运匠心的艺术手腕。

司马光著书的意图，在于通过历史事实，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。所以他说：“臣今所述，止欲叙国家之兴衰，著生民之休戚，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，以为劝戒”（《通鉴》卷六十九“臣光曰”）。由此可知，司马光编写历史，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“叙国家之兴衰”，即叙述历史上统治阶级是如何统治人民的；另一方面是“著生民之休戚”，即记载人民群众在封建统治下是怎样生活和斗争的。司马光当然不懂

得也不可能懂得阶级斗争的学说，但丰富的历史事实，特别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严酷事实，使得他看出了人民休戚与国家治乱之间，存在着息息相通的关系。因而《通鉴》对于这些方面的记载也就比较详尽而真实，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。

《通鉴》不仅突出地记载了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情况，并且适当地叙述了兵、刑、礼、乐以及政治、经济制度的变迁。至于历法的改革，典籍的聚散，河渠运道的开凿，陂塘水利的兴修，也都在所采录，这就可见《通鉴》内容的十分丰富了。

从《左传》以来，史家著述，多有论赞，对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作者的看法，以寓褒贬劝戒之意。《通鉴》中也附著了许多评论。那些评论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司马光本人撰写的，有一百一十八篇；另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，有九十七篇，共计二百一十五篇。这些史论作为《通鉴》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司马光在评论中对史事的抑扬褒贬，正是他贯彻“资治”这一政治目的的点睛之笔；它和《通鉴》内容的取舍编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从这里也充分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、历史观点，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。

《通鉴》的编写也存在一些问题。第一是纪年问题。尽管司马光不为正闰论所囿，按照“僭年纪事”的原则，使用一个特定的王朝年号编次史事，这在统一的时代倒也可以，遇到分裂的时代就有问题了。例如三国时代，只用曹魏年号，以魏年纪吴、蜀之事；南北朝时期，只用南朝年号，以南朝纪年书北朝史事。这样，纪年与纪事脱节，使人对吴、蜀与北朝的史事，茫然不辨其本国年代，造成阅读的困难，而且也不免带有主从、尊卑的正闰论色彩。

同时，在一年中遇有年号变更时，《通鉴》“皆以后来者为

定”（《与范梦得》），如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改元延康十月魏文帝即位，又改元黄初，《通鉴》只用黄初纪年，而所载实多汉事。隋唐之际的纪年更为特出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立杨侑为帝，改元义宁，《通鉴》止书是年为义宁元年。次年（即大业十四年）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，五月李渊建国，改元武德，《通鉴》即以武德纪年，通计前后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，炀帝尚在，而不见大业年号。这样的纪年方法，既不反映某些年号起讫的准确时间，又造成了纪年与纪事名实不符的矛盾，正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所说“颇有窒碍不通之处”。

第二是内容问题。《通鉴》出于“资治”的目的，取材着眼于历代的治乱兴衰，是非善恶，主要是一部政治史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所以书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军事史料。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，如经济制度和各种财政经济的措施，虽然也有记载，分量就要少得多。文化方面的记载更少，文学家如屈原、陶渊明都没有提及，杜甫是因王叔文口吟其诗才提到的，科学家一行是因进谏才提到的。像记载扬雄、王通、刘知几卒年的事，是不太多的。这虽不免为体例所限，但也使人有美中不足之处。

第三是史实问题。司马光对史料的考订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但是仍然不免存在着一些疏漏和错误。如晋安帝元兴二年，姚兴遣使者梁斐、张构使沮渠蒙逊，《通鉴》则称“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”，把使者两人并做一人。宋文帝元嘉七年，魏攻虎牢，伊州刺史尹冲投缢而死，《宋书》和《魏书》记载大致相同，而《通鉴》却说尹冲降魏，把一个壮烈牺牲的英雄，写成忍辱偷生的降将。唐昭宗光启元年，李克用逼长安，昭宗出走凤翔，乱兵焚掠长安，宫阙萧条，鞠为茂草。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因此事而追叙“黄巢据京师，九衢三内，宫室宛然”，《通鉴》却称“黄巢焚长安宫室而去”。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记载，反映了司马光强烈

的阶级偏见。

此外，《通鉴》叙事，因刊削未尽而造成的前后重复，因删改不当而造成的语意不明，因校对不精而造成的称谓不一等等毛病，也还不少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不过，总的看来，《通鉴》的缺点和局限与它所取得的成就，是不能相比的。瑕不掩瑜，它无疑是我国古代史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四

《通鉴》既是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，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长期以来诵读的人很多。一九五七年我给历史系开选修课的时候，便开了《通鉴研究》这门课。课程的内容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介绍《通鉴》的作者、编集、价值以及注释、影响等问题，使学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。另一部分是选录《通鉴》中的若干篇章，进行讲解，使学生有一个具体的认识。这次把文选部分重新加以整理注释，并由顾奎相同志帮我补充了一些篇章，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，以供高等院校学生、文史工作者和中青年干部等学习参考之用。

本书所选主要是《通鉴》记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而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艺术性的篇章，共计二十五篇。这些篇章，从时间上看，涉及到战国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几个历史时期，而以汉唐两代选的较多。从内容上看，不仅有政治、军事上的各种问题，而且涉及到经济、文化、民族等方面；其中还选录了《论宦官》一文，以见《通鉴》中史论一体的特点。

《通鉴》的版本很多，但都不及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，所以我们便以这个本子作为依据，进行标点和分段，只在少数地方为了更清楚更简单起见，略有更动。

每篇文章之前都作了简短的说明，介绍它的时代背景、主要内容和意义，以便读者参考。

文中较难的字和词，酌加注释，概用语体文，力求简明扼要。凡需要注释的词句，均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，以后一律不注。注音的字，直音和拼音并用。注文都放在每段的后面，以省翻检之劳。

文中遇有讹文脱字，均据章钰《通鉴正文校宋记》加以注明，为简明易懂起见，皆注称别本某字作某，或别本某字上（下）有某字，原文一般不予改动。

古籍的选注，是一项很为重要而又并不容易的工作，尽管我们在选文和注释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，限于水平和时间，一定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，诚恳地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以便将来修改。

陈光崇

1986年8月5日

目 录

前 言

三家分 晋	1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	9
秦并六 国	19
汉与匈奴和 亲	35
董仲舒对 策	43
张骞通西 域	55
赵充国屯 田	67
班超通西 域	83
梁冀专 权	95
黄巾 起义	113
赤壁之 战	127
晋武帝平 吴	137
肥水之 战	149
魏孝文帝迁 都	163
韦叡救钟 离	177

隋初新政——	187
贞观君臣论治——	197
唐高宗立武后——	213
天宝长安之乱——	227
杨炎与刘晏——	243
陆贽论政——	255
司马光论宦官——	269
裘甫起义——	279
契丹灭后晋——	291
周世宗伐北汉——	311

三家分晋

《通鉴》的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一事开始。以后这三国就在今河北、山西、河南三省地区扩张势力，加上原有的齐、楚、燕三国，总称为关东六国，与关中的秦国相抗衡。到秦始皇统一六国（前221年），共历一百八十二年，是为战国时期。

战国以前的历史，《通鉴》为什么没有记载？宋人刘恕曾经问过司马光，司马光说：“周平王以来，事包《春秋》，孔子之经不可损益。”刘恕又问，为什么不始于《春秋》绝笔的那一年？司马光说：“经不可续也”（《通鉴外纪自序》）。如此说来，圣经既不可损益，又不可续写，司马光自我作故，选择了三晋封为诸侯这一年作为开端。不过他在文中仍然追述前事，一直从智宣子立瑤为后讲起，详细叙述了智伯求地，三家共灭智氏的史事。按《春秋》绝笔于鲁哀公十四年，《左传》续写至鲁悼公十四年韩、魏共灭智伯事而终，《通鉴》所载，不续《春秋》，实际上是上接《左传》。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

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^①。

①魏的先世，毕公高后裔，与周同姓。自毕万始封于魏。至魏舒为晋正卿；三世传至魏斯。赵的先世，造父后裔。自赵夙始封于耿，至赵盾为晋正卿；六世传至赵籍。韩的先世，出于周武王。至韩武子事晋，封于韩原。至韩厥为晋正卿；六世传至韩虔。

初，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①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鬓长大则贤②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③，巧文辩惠则贤④，强毅果敢则贤；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⑤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⑥。

①宵，智宣子的庶子。

②鬓，两颊上的头发。

③给，充足。

④巧文，巧于文辞。

⑤待，宽假。

⑥太史，掌管氏姓的官。智果为避智氏之祸，通过太史别为一族。

赵简子之子①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。将置后，不知所立，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②，以授二子曰：“谨识之③！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辞；求其简，已失之矣。问无恤，诵其辞甚习④；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⑤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

①赵简子，文子之孙，名鞅。

②简，竹策。

③识，记。

④习，熟。

⑤奏，进上。

简子使尹铎为晋阳①，请曰：“以为茧丝乎②？抑为保障乎③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！”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无恤曰：“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④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”

①为，治理。晋阳，今山西太原。

②茧丝，意思是剥削人民，如抽茧之绪，不尽不止。

③保障，意思是使民休养生息，如筑堡以自障，越培越厚。

④而，汝。少，轻。

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，与韩康子①、魏桓子宴于蓝台②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不备难③，难必至矣！”智伯曰：“难将由我。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！”对曰：“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④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弗备，曰‘不敢兴难’，无乃不可乎！螟、蚁、蜂、虻⑤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！”弗听。

①韩康子，韩宣子的玄孙，名虔（《通鉴补》作虎）。

②魏桓子，魏献子的曾孙，名驹。

③主，春秋以来家臣对大夫的称呼。

④见，同现，发现。引文见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